

Quarantine

隔离，作为一种孤立与预防性排除的状态，是西方社会的基本心态。

从艾滋病的蔓延（1981年），到双子塔恐怖袭击（2001年），再到新冠（Covid-19），人们逐渐却又无可挽回地把自己排除于社会生活之外，以免为自身的生存冒险。

在这个世界的这一隅，人们选择生活在自己的屋内、自己的门后、自己的墙后、自己的脑中，编织出关于未来理应奇迹般降临之事的种种非凡幻想，寄望于一种徒然的可能——寄望技术能够填补心中意义与温暖的空虚。

《Quarantine》系列聚焦于富庶的西方文明中当代人的图景；

这是一种存在：因害怕死去、或害怕活得不够久，宁愿想象自己在活着，用真实生活的、令人安心而安全的替代品把自己团团围住。

这种心态排斥身体作为运动与欢愉的工具；

身体首先变成传播致命病毒的工具。

生命的经验变得虚拟、错位，主要转向视觉这一感官以及大脑这唯一的器官。

我描绘我那些无头的模特，以一个大球代替头颅——一个塞满了难以言说、无法实现的欲望，

塞满了恐惧与希望的球；那希望寄托于一个美妙的未来，在那里将再次可能真正地活着。

在一种类似囚禁的状态中，在我们行动自由受到限制的处境里，

无论出于何种理由，我们的心智唯一的可能，便是借由想象去旅行，

奔向新的世界，以便继续停留于其自由的自然状态。

艺术与文化在法西斯主义、斯大林主义以及其他独裁之下当然并未死去；

唯一死去的，是那些停止做梦的人的心智。

危机使一个体系或一个过程的真实状况暴露无遗；

2019/2020年的疫情危机也有其可取之处：它帮助我们认清自己身处何地，

并帮助我们把心智从我们至今不断对自己重复的、关于我们现实的虚构而伪善的叙事中解放出来。

危机让我们看清了我们真正的优先事项——

即便不是作为一个社会，至少作为一群生活在同一国家、服从同一法律的人。

当我们不得不在必要服务与非必要服务之间做出抉择时，

我们意识到：公共教育、体育、艺术与文化并不在其列，

当然，还包括否定了宪法所确立的、人在国土上自由流动的权利。

毕竟，「意大利是一个建立在劳动之上的民主共和国」，而其余一切历来都排在其后。

劳动者除了拥有支付房租、在市场上买菜的最低生存资料之外，

其生活是否满足，无人在意。

公共教育被视为次要，

因为其质量低劣；我们历来都知道，若想给子女高水平的教育，就必须在私立领域接受培养。

体育同样名声不佳：在我国，保持良好的体形，与其说被视为增强自身免疫力的方式，不如说被视为法西斯倾向的症候。

相反，高水平的体育（其中存在巨大的经济利益）

则被认为是必要的，并且在没有任何强加于普通公民的荒谬防范措施的情况下照常进行。

艺术与文化，口头上被认为重要，但普遍的看法是：它们属于那些并不真正工作之人的领域。

经济领域吞没了生活的一切领域，使得即便在本质上无法产生剩余价值的领域，也必须创造剩余价值。

公共医疗变成了医疗企业，学校变成了学工结合，

艺术变成了投资对象，科学变成了大基金的投资领域——

这些都是一种病症的征候：对创造经济性「更多」之永恒追逐。

在这种视角下，一所学校即便对社会而言有成本，却能培养出负责任、团结而快乐的人，也毫无价值；生成一种不同于经济的剩余价值，被视为次要。

此外，经济领域所生成的剩余价值，被再投资于新的活动，以追逐新的剩余价值，为了纯粹的积累而无限重复，而非投入被视为次要的领域。

最后，相当一部分税收被用来在这些经济领域陷入困境时，去扶持它们本身。

媒体在这场危机中的角色，暴露出其无力向公众呈现一系列相互对照的论点。

媒体被压平为单一的视角，甚至用「否认者」一词来指斥不同的观点——

这个词诞生于截然不同的历史情境。

在主导论点与其他论点之间，不设任何交锋，也不允许谈论。

危机之际，媒体采取某种战争模式，恐吓公民，并支持既定权力及其所采取的措施，无论那些措施是什么。

借由这种模式，它们增加了点击与销量；

我们所有人都想知道是否正发生某种特别严重的事，于是它们便找到了与政治权力（用于出版业的公共资金）及经济权力拉近关系的好借口。

公共媒体，与学校、医疗、司法、艺术、文化及其他领域一样，

若被置于经济领域之外，本可为一个共同体（倘若存在这样一个共同体）更好地履行其职责，

正如鲁道夫·斯坦纳（Rudolf Steiner）在一百年前就已理论化的那样。

不教书的学校、不报道的媒体、不治病的医院、以及靠制造荒谬的官僚迷宫来窃取我们时间的行政机关与公共部门；

除了在其中工作、并因提供通常糟糕透顶的服务而领取薪水的人之外，
谁又从使用这些服务中获益？
我们难道要主张：有一样运转失灵的东西，胜过一无所有？
这难道不正是那同一套逻辑——它促使我们去购买、消费有害而污染的产品，
而不是干脆不用它们？
既然这个体系显然无力创造出公共服务，那么到了这一步，
干脆彻底放弃它、把生活的一切领域私有化，难道不是更少一些伪善吗？

在新冠的语境下，宗教显得如此无用，以至于关闭了教堂。
我们曾以为大多数意大利人拥有一种与基督讯息相连的精神生活；
再没有比这更虚假的了，而我们从选举结果早已看清：显然，许多人去教堂只是为了完成一种
迷信的仪式，而这仪式已被病毒变得既危险又无用。
我们真正信仰、并从中汲取慰藉的唯一宗教，是科学；
但我们以宗教式的狂热信仰它：只存在唯一一位真正的病毒学家，就连教皇也在他面前俯首。

Luca Motolese

motolese.com — 原文为意大利文